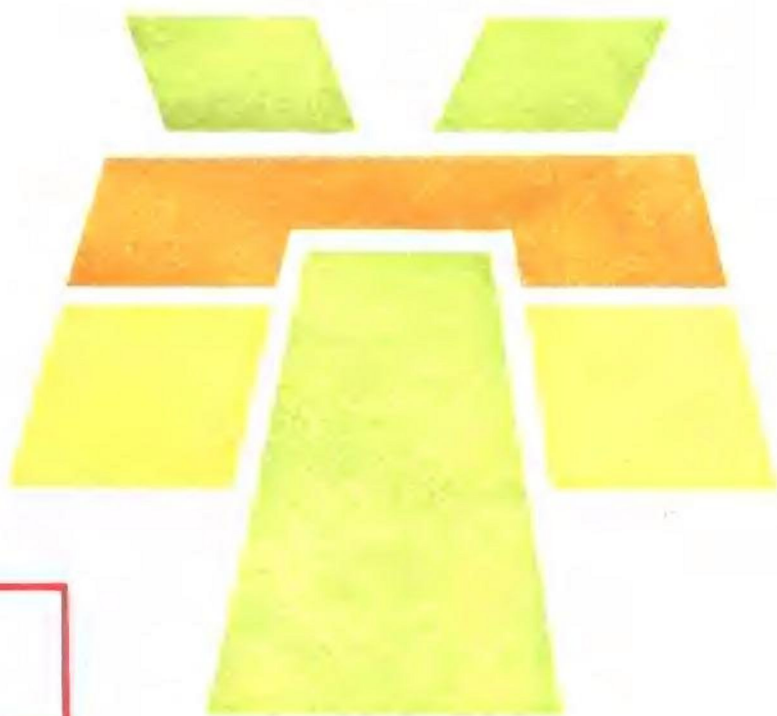


动荡的消费结构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

主编 韩朝华

胡 健 著



7.3

责任编辑 陈 辉
监 印 夏书林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

动荡的消费结构

胡 健 著

*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四颁赏胡同4号)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发行

*

1989年3月北京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 4.5

印数: 00001-50000册 字数: 101千字

ISBN7-80060-309-1/F·36 定价 1.65元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

顾 问 厉以宁 周叔莲
主 编 韩朝华
副主编 张润峰

作者小传

胡健，1959年生于甘肃天水。1982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7年于陕西师范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已发表论文10余篇，并出版译著《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政治制度》（合译）。

前 言

从 70 年代末至今，十年改革，十年探索，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经历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新旧杂错，真假共生，良莠并存。它们扑朔迷离，虚虚实实，有时使人觉得胜利在望，有时又令人感到困惑莫明。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到底取得了怎样的进展？中国经济的前景究竟如何？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现代化的人渴望了解的问题。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是描述和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和改革态势的系列著作。它所探讨的都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具紧迫性、根本性和危机性的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和硕士，他们是青年，热血沸腾，怀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敢于直陈利弊；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中，他们学有所专，训练有素，对当代中国经济有独到的研究和认识。他们支持改革，但对现行的各种改革思路和方略不尽赞同；他们研究改革，但与当前学术界的主流学派有明显区别。他们有独特的透视角度，新颖的分析思路。他们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描述和分析不仅富于现实感，而且带有批判性。

中国人素好浓描成功，淡写失误。看“主流”，列功绩，报喜不报忧，似乎成了部分中国人反映现实的准则。中国人惯于今是而昨非。苛责前代，溢美当今，把眼前的困境和难

题归咎于前辈，则又是某些人评论现实的规矩。中国人擅长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以不变应万变是中国人应付现实的方式。然而，当今的时代是以竞争定地位的时代，当今的世界是靠经济、科技实力论输赢的世界。中国要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世界里争一强国地位，必须在把握现实的方式上消除根深蒂固的阿 Q 精神、官场习气和士大夫心态，树立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现实、变革现实的社会人格。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崇尚对现实的正视、批判和变革。它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不粉饰太平，不危言耸听。它从中国经济政策和战略的实际社会效应出发，运用现代经济科学的最新成果，考察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分析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战略的得失，探寻扫除障碍的途径。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不是研究纯学术问题的艰深专著，而是面向社会各界的通俗读物。它的宗旨是将青年学者对中国经济现状和前景的最新思考推向社会。它为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但不熟悉现代经济理论的人士服务。这套丛书资料翔实，分析严谨，文字晓畅，既富于科学性和开拓性，又具有大众性和可读性。每一个勤于思考社会问题的读者都将从这套丛书中受到启发。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在各自专题领域中的独立开拓者。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难免存有分歧。我们认为这是好事，分歧可以引起争论，启迪思路，正是这种不一致性才可以为读者透视中国经济提供一个多维的参照系。而一切结论性分析都将属于读者自己。

韩 朝 华

1988 年 12 月于北京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抑 制	(3)
1-1 目标的“物化”	(3)
1-2 “偷尝禁果”的惩罚	(9)
1-3 抑制性特征	(12)
1-4 蔬菜与发卡	(16)
第二章 突 变	(18)
2-1 结构突变	(18)
2-2 “用”品支出攀高倾向	(26)
2-3 “偿还”心理效应	(33)
2-4 轻“末”遗风	(39)
2-5 “东亚病夫”之谜	(42)
2-6 膨 胀	(44)
第三章 制约因素	(48)
3-1 有限与无限的矛盾	(48)
3-2 收入约束	(54)
3-3 敏感区	(61)
3-4 亦老亦新的难题	(64)
3-5 其 他	(71)
第四章 合理化构想	(77)
4-1 民以食为本	(78)
4-2 一个关键难题的解决	(84)

4-3 如何调整	(92)
4-4 先行的一步	(98)
4-5 看得见的手	(102)
第五章 世纪目标	(107)
5-1 外面的世界	(107)
5-2 “小康结构”素描	(111)
第六章 对比中的启示	(119)
6-1 “兄弟”家计一瞥	(119)
6-2 “邻人”家计管窥	(127)
6-3 治本为上	(132)

引 言

如果说，改革给人们的生活选择带来了一定的“宽松度”，才拉开了重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问题的帷幕，那么，如何消除近年来的消费膨胀危机，如何寻求实现本世纪末“小康”生活目标的最佳渠道，又把对消费结构问题的探讨推到了改革的前台。

按其最一般的含义，消费结构是指实物形式的各类消费资料在消费资料总量中的比例，是指价值或价格形式的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例。由于经济生活本身既包括宏观经济也包括微观经济，因此，从层次上划分，居民消费结构就包括宏观消费结构和微观消费结构。探讨居民消费结构问题，就是要寻求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下人们各种消费比例关系的优化途径，寻求为此目标在一定时期内所需要的合理结构选择；由此，将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集体消费与个人消费的适度比重，家庭消费中各类消费支出的选择，各社会阶层和社会团体之间的消费构成，以及资源环境与人口状况、法律文化和民族道德等多种因素。

但是，这不是一本体系庞大的教科书，也不是一部构思深远的学术专著。留给这本小册子的任务，只是对那些透过我国居民的衣食住行反映出来的社会难题和改革难点提出我们的考察结论和粗浅观点。

为此：

前两章将考察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在两种经济运行体制下

的变迁，以及目前存在的若干不合理倾向；

第三章将结合对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一般因素的考察指出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主要因素；

第四章提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的一些初步构想；

最后一章，将对人们最为关心的到本世纪末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前景做一项粗轮廓的预测和描绘。

无论是篇幅的规定，抑或笔者的能力所及，面前的这本小书既不可能是一篇系统的研究报告，也说不上是一篇“抛砖引玉”之作。如果能通过这本小书的叙述引起读者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问题的重视和关心，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第一章

抑制

历史和现实是割不断的，无论人们怎样看待二者之间的联系，我国消费结构形成如今的格局，是历史演化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透视现实，就必须检索历史。但是，历史是一个庞大的概念。完整地总结历史，既非笔者的能力所及，也不是这本小书的目的。因此，让我们缩短时间的长河，把对历史的检索集中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传统经济体制下居民消费结构的考察，看看从中能够勾画出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又能够从中总结出哪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1-1 目标的“物化”

是吃饭在先还是建设在先？这个看起来并不深奥的问题，却困扰了中国人几十年。如果换用较准确的经济学术语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怎样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不要以为回答这个问题轻而易举。稍加考察我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复，划分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

本来，生产和消费都是客观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互相联

系的经济行为。没有生产，也就无从谈起消费，因为消费总是具体生产产品的消费；换一个角度看，没有消费，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因为生产将失去意义。生产与消费的这种关系说明：二者的联系在于互相之间不可偏废，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并存为前提。但是，指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并存和统一关系，并不是说二者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设计中具有同等的排序。事实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看，人的生活的改善总是第一，而生产建设只能最终服务于这一目的。社会的这种发展规律，既存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社会。换句话说，生产作为一种手段，最终从属于消费这个使人自身得以发展的目的。

答案就是这样简单。但是，寻找答案的过程，却常常被扭曲。当经济发展进而生产发展的目标被视为改善生活质量和提高消费水平的手段时，生产的目的是指向明晰的“人化”目标；当经济发展和生产发展仅仅被视为生产本身进一步发展的手段时，生产就趋向扭曲的“物化”目标。

经济发展目标“物化”，生产只是为了生产，正是我国传统体制下几十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之一。

一、“畸重”的生产结构

生产结构“畸重”化，或者说，在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比例关系中重工业片面优先发展，农业与轻工业相对落后甚至绝对落后，是“物化”目标的第一个现实结果。

建国初我国国民经济接受了原有落后农业经济国的底子。农业和轻工业比重占绝对优势，重工业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历史遗留的这种特定生产结构给经济生活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落后性质的生产结构，无从挑起建造新型国民经济基础、振兴中国经济的重担；另一方

面，它又有一个特殊的产品结构——中间产品少而最终产品多即生产资料少而基本生活资料多。由这种双重特点所决定，虽然整个国民经济难于实现飞跃，但居民所需基本生活资料却也不匮乏。

但是，满足低标准的基本生活需要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国度的目的。他们的目标，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以比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快数倍的速度建成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由此不仅使中国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林，而且从实践中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急于求成的理想主义冲动，或许还加上尽快摆脱中国人近代以来落后挨打地位的民族心理刺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开始就走上了追求“物化”而非“人化”发展目标的扭曲道路，并形成了“畸重”发展的生产结构。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把投资重点放在重工业上的“畸重”发展进程。“一五”时期，重工业基建投资 212.79 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 36.1%；农业基建投资 41.83 亿元，占 7.1%；轻工业基建投资 37.47 亿元，占 6.4%。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畸重”发展有其有利的一面。生产结构的部门比例关系基本协调，农、轻、重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开始接近：农业由初期的 45.4% 降为 38.2%，轻工业由 22.2% 上升到 23.1%，重工业由 12.2% 上升为 16.2%。但是，“一五”时期的另一面——重工业所占投资比重及其增长速度偏高的迹象却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

“一五”的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为此，“二五”时期安排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适当抑制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减缓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增加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本来应当是生产结构调整的必要步骤，但

是，“二五”计划的安排，非但没有扭转“一五”时期重工业投资和发展速度已经偏高的势头，相反，在决策系统诗人式的“大跃进”口号下，“赶超英美”的前景诱发了人们的浪漫冲动，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步伐越迈越大。重工业的基建投资“二五”时期较之“一五”时期增加 2.1 倍，占基建投资总额的 54%，农业产值和轻工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分别降到 23.9% 和 22.9%，重工业产值由“一五”的 16.2% 猛升到“二五”的 32.6%，增长了 1 倍多。其结果，正式形成了“畸重”型的生产结构。

然而，浪漫不等于现实。“畸重”的结构，加上突发性的天灾人祸，不仅未能带给人们“跃进”的果实，反而使中国人陷入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悲惨泥潭。

无疑，不论是摆脱困境，还是为了以后的发展，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了。“困难时期”之后的“三年调整”阶段，部门间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略略有所扭转：农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二五”时期的 23.9% 上升到 31.7%，轻工业比重由 22.9% 上升到 24.3%，重工业的比重由 32.6% 下降到 27.1%。经济增长速度终于转负为正，结构偏差略有矫正。

但是，好景不长。调整从来就只是被迫退却，“物化”的发展目标才是决策系统向往的目的。“三年调整”虽然使形势略有好转，却并未解决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从随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直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十多年的时间里，生产结构的“畸重”局面非但未得到进一步的矫治反而愈演愈烈。“三五”时期，重工业基建投资又上升为 498.89 亿元。“四五”时期猛增到 874.94 亿元。“五五”时期则达到了顶点，突破了 1000 亿大关，猛增至 1075.46 亿元。与此增长

规模相适应，上述各时期重工业基建投资在基建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达到 51.1%，49.6%和 45.9%。与此同期的农业基建投资规模从来就没有超过 250 亿元，轻工业更是相形见绌。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局面最好，但其基建投资额也不过 156.25 亿元，占投资总额比重不过是 6.7%。

从“一五”到“五五”，近 30 年的时间内追求“物化”的经济发展目标导致“畸重”发展的生产结构。这种结构确实改变了建国初的局面：中间产品变少为多，最终产品变多为少；生产资料由缺到足，而生活资料由足到缺。由此，经济增长速度尽管提高不慢，但居民消费水平却从来没有得到相应提高。

二、“高积累”的分配格局

高积累，国民收入分配中轻消费，重积累，是经济发展目标“物化”的又一个现实结果。

1. 表现之一：高积累率

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将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类。在收入水平既定时，二者的关系此长彼消：积累基金多则消费基金少，或者消费基金多则积累基金少。这种此长彼消的关系，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被称为积累率。

已有的实践证明，积累率水平的确定，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我国传统体制下几十年，除“一五”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积累率较合理外（分别为 24.2%和 22.7%），其他各期积累率在“物化”目标制约下一直偏高：“二五”时期 30.8%，“三五”时期 26.3%，“四五”时期 33.0%，“五五”时期 33.3%，其中个别时期甚至跨过 40%大关（如 1959 年的 43.3%）。

积累率过高不仅给后来的调整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六五”前期一直未能降到 28%以下),而且对消费产生抑制效应。

(1) 因积累率过高导致积累基金增长速度远远超出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从 1952 年到 1984 年,积累基金增长 12.28 倍,同期的国民收入只增长 8.13 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更慢,只有 4.38 倍,积累基金增长速度是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 1.51 倍,是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 2.8 倍。

(2) 积累率过高还使积累基金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从 1952 年到 1984 年,消费基金增长 7 倍,人均消费基金只增长 3.8 倍,人均居民消费基金只增长 3.3 倍。积累基金增长速度为消费基金增长速度的 1.75 倍,为人均消费基金的 3.61 倍,为人均居民消费基金的 3.72 倍。

积累率过高不仅使积累基金的片面增长超出国民经济的负担能力,更重要的,还是消费实际水平下降,实物消费结构恶化。这种分配格局,使我国经济改革开始后面临的一个长期难题便是如何确定积累率的合理界限。

2. 表现之二: 积累资金的使用上轻“肉”重“骨”

高积累率是为了保证“物化”目标的实现,而目标“物化”,又使积累基金的使用不合理。按用途划分,积累基金可分为生产性积累基金和非生产性积累基金:前者直接用于物质生产及其储备,后者服务于基础结构设施及其储备。二者的关系,可称为骨头与肉的关系。传统体制下重“骨”轻“肉”,再一次体现了“高积累”的分配格局:

(1) 基本建设投资额比重不合理。重“骨”轻“肉”,使传统体制下几十年间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一直大于非生产性建

设投资比重。从“一五”到“五五”，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从67%提高到73.9%，并且多数时期超出80%。同期的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却一直一直在14.6%~26.1%之间徘徊，且多数时候在20%以下。骨头上缺肉，使基础设施长期落后。

(2) 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不合理。从“一五”到“五五”，生产性建设投资从394.5亿元提高到1729.94亿元，增长4.9倍，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却只从同期的193.97亿元提高到612.23亿元，提高3.15倍。

人体生理学常识说明：只长骨头不长肉，是一种发育不良的病态体格。只重视生产性积累，不重视非生产性建设，得到的，正是病态的经济系统。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发展中国家经济振兴的历程，基础结构和基础设施先行于其他部门的发展，乃是后发展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共同经验。但是，基础结构先行，需要以非生产性建设的先行为先导，只重“骨头”不重“肉”，非生产性建设上不去，基础结构自然无从先行。

1-2 “偷尝禁果”的惩罚

《圣经·创世纪》中有这样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因在伊甸乐园中受青蛇诱惑偷尝禁果而受到上帝惩罚。从此后代人从出生之日起便身带“原罪”，必须终生为来世赎罪。经济发展的“物化”目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也正如这种“偷尝禁果”所受到的惩罚。

一、“有计划”的浪费

“物化”目标下的“畸重”生产结构、“高积累”分配格局，追求的是高速度和高增长。但是，高速度需要以充足的资源

条件为依据，以合理的经济结构为先导。我国经济在传统体制下的发展过程却表明，往往是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结构不合理而积压在仓库里。高速度只是虚假的高速度，现实的“高速度”是盲目追求高指标。

“大跃进”中曾有这样一幕闹剧：

1958年，河南长葛县负责人向八大二中全会报告，全县33万亩旱秋地都已深翻1.5尺，由此可增产百分之几十甚至一倍。当时的领导人对长葛县的深耕并未经过认真调查和试点，也没有考虑全国耕地土壤的复杂状况，仅仅是为了实现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便立刻号召在全国推广长葛的深翻经验，不仅深翻一尺，而且深翻二尺、三尺。其结果可想而知：劳动力大量耗费，且由于翻土过深，把生土翻到表面，破坏了土壤结构，使农业严重减产。

工业也相类似。“畸重”结构下为了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我国轻工业生产多年来开工不足。为了向钢铁工业供应充足的电力，常见的结局是让轻工业普遍让路，甚至不惜对轻纺业“拉闸”，迫使轻纺业“停三开四”，开工率减到80%、70%，最严重时竟达60%，产值则减少30%~40%。

二、投入不敷产出

为了保证高指标的实现，必须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但是，基本建设规模虽然一年大于一年，与付出的代价相比，形成的新生产能力却往往微不足道。

1958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总数达到1587个，1960年又达到1815个。基建规模的扩大推动了基建投资的迅速增加，1958年达279.06亿元，比上年增长84.5%；1959年达368.02亿元，比上年再增31.9%。庞大的基建投资规模并